

要鼓励基层积极创新土地利用政策

□□ 杜志雄



最近,两则浙江湖州农村建设用地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其一是6月8日全国首宗农业经营性项目“标准地”在“两山”理念诞生地安吉成功出让。该农业“标准地”由递铺街道鲁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挂牌出让,共计693平方米,出让年限至2058年,被安吉盈元家庭农场以33.6万元的价格摘得;其二是6月12日德清的全国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项目——开元颐居·地热森林度假酒店正式对外营业。

这两则新闻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们反映的虽然都是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安排如何适应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但实际上它们又是有着重大差别的。前者是基层根据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振兴的实际需要,围绕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进行的制度与政策新创设,而后者则是始于2015年自上而下推进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的“开花结果”。

农业“标准地”是指以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的休闲农业、农业科技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建设用地。这是浙江省湖州市政府于2019年6月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满足农业项目建设用地需求,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兴旺而专门创设的一种农村土地利用方式方法。

责任层层“甩锅”,是当前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典型表现。据媒体近日报道,山西省孝义市民政局原救灾科科长赵某,在救灾资金发放后不管不问,把监管责任“甩”给基层,让基层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导致全市各乡镇、街道不同程度出现救灾资金改变用途、滞留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最终,赵某受到问责处理。

这正是:
资金发放不监管,责任“甩锅”基层难。
权责清单要明确,属地管理当规范。

文 @十八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当前,以休闲和旅游为载体,集乡村各种产业产品于一体的乡村融合型产业发展对建设用地有巨大需求。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设新的土地使用方式方法来适应和满足这个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应该支持和鼓励基层政府,积极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切实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立足之基。

2018年底,受规划空间保障、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制,休闲农业等新乡产业主体依照程序中请建设用地十分困难并影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大局。农业“标准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反映出湖州市委、市政府根据湖州乡村产业发展特色,解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土地之困的责任和担当。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旧的土地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改革,还是新的土地政策和制度的创设和落实,从发起见到成效,时间都相对漫长。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的基础制度,它涉及的面、牵涉的利益格局调整广泛而复杂,同时它还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适应性调整等等。谋定而动、稳步推进和慎重推广极其重要。湖州市德清县作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县,首宗直接入市的地块从交易、建设到开业经历了5年多时间。农业“标准地”从2019年6月底创设到今年6月初完成第一宗农业“标准地”成功出让也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本

身表明了农村土地改革的艰难和复杂。因此,在对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时效性上,抱着“一改就灵、一改见效”的态度是不切实际的。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究竟应该以谁的利益为基本立足点?农地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多元的,如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服务乡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和农村集体收入等等,不一而足。但无论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否真正落实了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则是衡量一切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据了解,5年来,德清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已入市241宗,面积1952.29亩,入市总额5.59亿元,实现集体收益4.48亿元,这项改革大大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村集体收入,从而为改善农民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保障。

而农业“标准地”的制度创设,其实质是市及各区县积极统筹建设用地指标,每年安排一定量的用地指标来保障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开发对建设用地之需。将建

设用地指标用于农业项目,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尤其是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还极为紧缺、地价城大于乡的情况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让渡。中央政府近年来以政策号召的形式提出,一些涉农项目可以安排5%-8%的建设用地指标等。但现实中在项目运行后,由于建设用地指标没能进入到土地利用规划中而无法落实,有的能落实也存在因指标被挪作他用而无法兑现的情形。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农业“标准地”制度是真正为满足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创设的,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依归的。

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以休闲和旅游为载体,集乡村各种产业产品于一体的乡村融合型产业发展对建设用地有巨大需求。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设新的土地使用方式方法来适应和满足这个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同时,鉴于改革是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支持和鼓励基层政府适应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需求,在协调好政府、企业、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以保护和增加农民利益为落脚点以及合法合规前提下,积极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切实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立足之基,推进乡村包括产业发展在内的全面振兴。



用“产业扶贫联盟”解决“老大难”问题

□□ 吴旭

据报道,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57名驻村第一书记共建的“产业扶贫联盟”,已与宝鸡市20家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与8家单位签订了消费扶贫协议;迅速形成的品牌效应,共带动4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会员3142名,其中贫困户占到30%以上;联盟旗下的花椒、苹果、香菇、肉牛、土鸡等16种农产品销售量快速增长,不到3年,累计销售收入近4000万元。

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对贫困山区的每个村、每个农户来说,如何围

绕市场需求积极有效地组织生产、开展销售,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应当看到,单打独斗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品牌影响力弱、生产销售难以规模化等弊端,又面临商家发来的大额订单难以满足供货要求的窘境。

“产业扶贫联盟”及其联盟扶贫产品直销店,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扶贫的形势要求。“扶贫产业联盟”对西部山区农特产品进行统一定价、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实现了产业发展信息共享、品牌共有、市场共进、销路共用,打通了生产、流

通、消费各环节的痛点、难点、堵点,为贫困地区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市场开辟了新天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下延伸的重要抓手。驻村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用激情与赤诚践行驻村诺言,用拼搏与奉献、实践与创新推动脱贫攻坚向前发展,让一个个乡村旧貌换新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社会的认可。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基础,也是

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对本村有哪些土特产品、优质农产品和产业发展具体情况都知根知底。第一书记“扶贫产业联盟”的“抱团取暖”、共同抵御市场风险的做法,不但能让群众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市场价格,增强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而且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这不仅能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加速了乡村振兴的步伐。

快递小哥成“高层次人才”诠释了什么?

□□ 李英锋

最近,来自安徽阜阳的“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被评上了“杭州高层次人才”,不仅能在落户、子女就学、医疗保健、车辆上牌等方面享受照顾,在杭州购买首套房还可获得100万元的补贴。

快递小哥成了“杭州高层次人才”,连李庆恒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实际上,不仅是李庆恒,很多人们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大都和高原学者、专家、教授、科研精英、行业带头人、技能达人等群体划等号,看似不起眼、没啥技术含量且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快递小哥成了“杭州高层次人才”,成了杭州多项沉甸甸的福利和补贴重点照顾的对象,着实刷新

了人们对人才的认知。

然而,看看李庆恒的工作履历和现实表现,你就会明白,他获评“杭州高层次人才”实至名归。基于宪法、劳动法等法律确立的公民平等、劳动平等价值观,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行业都是平等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人才,不管是谁,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只要努力付出,扎实学习和钻研,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具备了较强的能力,作出了有益贡献,都有机会成为人才,甚至高端人才,都有机会出彩。快递小哥成为人才,具备法律基础、社会公德基础和劳动价值观基础。

具体到李庆恒个人,他因向往快递行业的热闹闹闹、忙忙碌碌,因喜欢快递行

业的充实性、挑战性,因看好快递行业的发展前景而选择成为一名快递小哥。他干一行爱一行,肯吃苦、肯学习,动作麻利、有悟性,他在“618”“双11”等电商大促、快递业最忙的季节,主动支援一线,各处派件。他从入职第一年,就连年参加快递员比赛,技术日益精湛,年年获奖,在去年8月举办的浙江省第三届快递职业技能竞赛上,他更是获得了快递员项目的第一名。至此,李庆恒具备了成为人才乃至高层次人才的基础和能力。正是凭着这个全国快递行业规格较高、含金量较大比赛的冠军,李庆恒被浙江省人社厅授予“浙江省技术能手”称号,而这称号让他具备了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D类”

的充分条件。李庆恒成为“高层次人才”,是个人爱岗敬业、努力奋斗、苦练技能的结果,也是浙江省和杭州市平等对待劳动者和岗位、尊重人才且“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结果。

快递小哥成“高层次人才”诠释了最朴素的劳动价值观——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启示我们,只要珍惜工作岗位,不断锤炼和提升自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人才,都有机会上行,都有机会拥抱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同时,政府、企业以及相关单位也该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才观,为各行各业劳动者成为人才畅通渠道,提供平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019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本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第一责任人”,“市县乡抓落实”,“县委书记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

基层政府尤其是县级党政部门,推动乡村振兴的职责很重。可以说,在党中央“三农”工作大政方针的统一

指引下,各地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关键在于县级政府的推动落实情况,在于县级政府的担当意识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产业发展的主体,是农民生产者和涉农企业;决定乡村产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与此同时,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极其重要。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科技服务支持、市场营销支持等。在这些领域,没有政府的支持,仅仅靠农民自己或者涉农企业,是难以很好实现的。

产业发展规划,是最重要的事。现在,不少县域已经在向着“一县一品”或“一县几品”方向发展,这是符合农业区域化发展规律的。关键是具体产业的选择,不能是县乡村干部“拍脑袋”决策,而是要尊重、符合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这就需要组织技术专家和产业经济专家,提供科学决策咨询指导。要组织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农民个体做不到,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也力有不逮,而由县级政府出面,则更为可行。

要发展现代农业的业态,往往需要引进外部的资金、管理和技术等要素,尤其是一些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政府部门搭建招商引资的平台,非常重要。例如,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米埗小镇的民宿,就是当地政府领导出面,到外地考察引入了一个经营民宿经验丰富的企业,由该企业与村集体协商合作搞起来的。

在发展精品高效农业方面,也需要政府组织进行各种方式的技术服务支撑,以保障农民生产者能够“种得好”。与此同时,还要通过信息服务、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产销对接活动等,让农民“卖得好”,让优质产品获得优价。

第二,农民居住建设规划。这一问题,极端重要,又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外出农民工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村,回去也没事干。于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回乡盖房子,而是在县城里买房。并且,很多地方正在形成新的风俗:农村青年结婚,要在城里(通常在县城)买房。因此,县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这一新变化,统筹考虑县城、乡镇和村庄未来的居住需求发展,制定出合理的符合发展实际的县城农民居住建设规划。如果已有的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县城和中心乡镇住房需求的大幅增加以及一些村庄居住需求萎缩的前景,则要据此对规划进行及时修改调整。

第三,生活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的垃圾、污水、厕所、村容村貌等方面的治理,是同样是需要基层政府强力支持和管理工作。在这些方面,尽管需要村民和村集体的全力全员参与,但是,在绝大多数地方,仅仅靠村民和村集体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很好做到的。这个方面的工作,也是长期性的。

第四,用好财政支农资金。除了少数沿海发达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县政府的自有财力都很有限,在保持正常的运转之外,可以拿出来用于“三农”投入的资金很少。然而,这些年来,中央财政以及一些地方的省级财政,都持续地加大了支农惠农政策的力度。根据调查,一个中部县级政府每年从上级政府获得的财政支农资金,通常有几十项之多,每年每项的资金额度从数十万到数千万。如何把这些上级财政拨款来的“三农”资金使用好、花出最大效果,是县级政府的重要职能。而是否有担当精神、务实态度和创新思维,决定着这些项目资金使用的实际效果。

第五,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乡村振兴的最基层执行单位是乡镇与村,因此,镇村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非常重要。选派优秀干部到乡镇任职、到村担任第一书记,是一条重要途径。同时,也要把表现优异的农村基层干部提拔起来。这种双向交流,有利于激发农村基层干部的活力。

乡村振兴中,配备好村集体组织的带头人,有关键作用。调查发现,在那些“明星村”,集体经济发达,农民收入高,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超群出众的带头人。“明星村”的村党组织书记,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德才兼备,是“好人+能人”。好人就是党性强,有奉献精神,公正无私等。有这样的人,可以保证村里面和谐稳定。但是要发展经济,带领农民致富,光是好人还不够,还需要是能人。能人,就是具有优秀的企业家素质,能够带领老百姓发展高效产业的人。所有的“明星村”党组织书记,都是这样的人。近年来,一些创业成功的农民企业家返乡回村,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出现了不少典型,例如在“三变”改革发源地——贵州六盘水市舍烹村。引导鼓励有“三农”情怀和奉献精神的农民企业家,回乡担任村组织负责人,也是配备农村基层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

征稿启事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请发:nmrpinghun@163.com

多为农村老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班”

□□ 王水成

现如今,在广大农村地区,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一些老年人拿着多功能的智能手机,但其实是把它当作老年机使用,除了打电话之外,发微信、看天气预报、看视频、网上购物等都不会操作。

因为很多农村家庭的年轻人在外打拼,没太多条件和机会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因而,一些有条件的农村不妨定期或不定期开设“智能手机培训班”,帮助农村老人解决这一难题。事实上,设置这样的培训班,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一能让农村老人通过学习跟上时代步伐。建设学习型社会,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贴贴标语、挂挂横幅,而是要扎扎实实落在具体的行动上。行政村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班”,能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能让农村老年人树立起学习意识,从而在一些方面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二能让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很多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除了看电视,就是晒太阳。对于他们来说,找不到生活乐趣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开办“智能手机培训班”,就能引导广大农村老人在

网络上找到一些“乐事”去做。有了这一方“快乐之地”,他们的晚年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有意思。

三能逐渐拉近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认识距离。农村老年人在学习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见多了、识广了,久而久之,他们与年轻人之间的认识距离会拉得越来越近,致致越来越相投,说话越来越投机,“代沟”也会越来越小。

四能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老年人一旦学会了智能手机操作,或是发微信,或是购物,或是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一点就通”“一拨就灵”“一付就收”,智能手机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五会拓宽老年人的视野并助力移风易俗。老年人学会了操作智能手机,视野就变得更加开阔了,对什么是歪风陋俗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助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良性发展。

开设“智能手机培训班”能切实提高农村的整体文化水平,有利于村庄各个方面的发展。希望农村能创造条件,多开设一些“智能手机培训班”,也希望能有各方面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促成此事。

乡村振兴基层政府应抓好哪些事?

□□ 柯炳生